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2012

# 地方的书写—— 新世纪城市电影中上海里弄的影像建构

李琦, 杨思汝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作为建构与传播城市形象的重要媒介, 城市电影是折射城市空间更迭的一面棱镜, 亦是思考城与人、人与地方关系的一扇窗口。在城市景观趋同化的当下, 里弄经由视听艺术的建构, 演绎出彰显独特气质的地方影像。新世纪城市电影对上海里弄的影像建构, 不仅向我们展示城市空间中地方的不同切片及其能指, 启发我们思考人地关系, 同时更凸显极其深刻的地方影像价值。里弄影像构筑的住宅特征与民居文化, 让不同代际、地域的观众在共享城市记忆的同时, 还能构筑独特的城市地方感, 强化观者的地缘认同, 凸显地缘文化价值。

**关键词:** 城市电影; 地缘文化; 城市记忆; 地方影像; 上海里弄

中图分类号: J9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6)02-0099-08

## Writing About Localities:

## The Cinematic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Lilong in Urban Movies of the New Century

LI Qi, YANG Sir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urban images, urban movie is a prism for reflecting the changes in urban space, and a window for thin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 and its people, as well as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s. At a time when urban landscapes are becoming homogenized, Lilong has been constructed through audiovisual art to interpret local images with unique qualities. The new century urban movies' cinematic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Lilong not only shows us different slices of places and their references in urban space, but also inspires us to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s, and at the same time highlights the profound value of local images. By depicting the residential features and folk culture of the Lilong images, these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s enable audiences across generations and regions to share collective urban memories while fostering a unique sense of urban locality, reinforcing the viewers' geographical identity, and accentuating the value of geo-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urban movie; geo-culture; urban memory; local image; Shanghai Lilong

收稿日期: 2025-10-11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湖南乡村公益电影放映研究”(25ZDB037)

作者简介: 李琦, 女, 湖南冷水江人,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媒介文化、视听传播、公益传播与传播社会学。

作为一种蕴含着人类价值与日常经验的凝结物,地方是人类创造的意义空间及人类情感、生活方式依附的空间,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庄子·内篇·齐物论》有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总要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人与地方的紧密联系,则是我们思考人地互动的重要路径之一。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城市迅猛发展,城市空间的重组需求不断增大,城市景观日渐趋同,地方性的传统元素日渐式微,以致出现“千城一面”的尴尬现象。如是,城市空间中差异化的地方自然成了众多导演关注与审视的客体。上海开埠之后,历经百余年历史嬗变,于这片物华天宝之地,逐渐孕育并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海派文化。作为该文化的物质载体与空间表征,海派建筑以其鲜明的文化特征,成为诠释海派文化的核心视觉符号。作为海派建筑的典型代表,上海的地标景观里弄,又称弄堂,汇聚着浓厚的人文气息与时代精神,包容并见证着城市的发展与一代代人的成长,具有丰富的人类经验。其在空间与时间维度上的演变,是一个透视人与地方关系的新视点。作为中国电影的摇篮,上海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期中国电影多以上海为取景地,里弄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意象之一。

在新世纪语境下,里弄的物质形态伴随城市化进程持续演变,其在电影中的表征方式,相较于早期电影,已被赋予了更为多元的时代意义与文化内涵。文化地理学中关于地方的认识研究,涉及人们在物质空间中的实践活动以及意义塑造的过程,可为以城市为叙事空间的电影(以下皆简称为城市电影)提供新视角,进而发展出一种解析电影的新思路与新方法,成为一个观察、理解及认识社会百态的新切入点。

本文以2000年后的城市电影为主要研究文本,聚焦当代城市影像空间中里弄这一广阔且多重意义复合体,并以“地方”的相关理论作为研究依据,尝试对这些文本进行剖析与阐释。基于此,本文将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城市电影建构出怎样的里弄影像?城市影像空间中的里弄隐喻映射出怎样的人地关系?城市电影再现上海里弄的地方影像有何文化意义?

## 一、真实与想象:城市电影空间中的里弄呈现

人类空间的意识与感受依赖于视觉,影视丰富并延展了人的感官体验,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论点。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电影是人的耳与眼等器官的延伸。城市电影塑造的地方影像可为人们提供“想象的地理”母本,并以影为媒,与“真实的地理”发生微妙的碰撞。城市电影选取城市中的某处景观为叙事底色,凭借影像重组、再现的功能,为人提供影像栖居,建构视觉听觉“诗意”般的想象空间。当代城市影像空间中的上海里弄,经画面及声音的双重建构后,将城市与影视文化元素相融合,赋予里弄新的影像生命力,再现上海的地方独特性,让观众在影像世界想象与重识上海。

### (一) 韵外之致:地方空间的美感呈现

城市景观向来是电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城市电影通过各种光影组合,来表现不同的城市空间和某种独特的意象<sup>[1]</sup>。作为上海城市空间中差异化的地方,高低错落的弄堂街巷使“国际魔都”不但具有了视觉反差感,且折射出历史文化韵味,凸显别具美感的地域风情。城市空间中的差异化地方赋予镜头更多的叙事视角,为电影艺术提供丰富视点与影像美感。

“石库门里弄民居在维持中国传统四合院住宅单体建筑基本格局的基础上,采用了西方联排式住宅的整体组合模式,形成中西住宅建筑模式融合的近代住宅建筑。”<sup>[2]</sup>迥异于北京传统四合院的独立院落式住宅,上海里弄的联排式布局展现了海派建筑因地制宜的特点。这种紧凑高效的格局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不仅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市民的居住需求,更生成一种独特的生活空间——公共与私密的交汇点、个体与集体的共生场域。里弄的狭长甬道与联排建筑形成的紧密格局,使得邻里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频繁互动,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交集逐渐形塑了一种琐细日常的生活空间。充满烟火气息、独具东方风韵的弄堂景观,不仅是海派文化与世俗民风的物质载体,也是城市空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导演利用大众熟悉的城市地景,在城市空间内敏锐捕捉独具风韵的地方意象,挖掘并探索

蕴含其中的具象美感。第五代导演彭小莲执导的《假装没感觉》(2001)将石库门弄堂作为叙事场景,其封闭式的两层住房结构构成紧密且独立的居住空间。电影开篇便采用长镜头来展现石库门弄堂晨曦的民生实景:狭窄逼仄的天井晾晒着各式衣物,缠连交织的电线填满了拥挤繁杂的生活空间。导演运用朴素平实的镜头语言,勾勒了一幅当代市井生活的真实图景,建构了一个与现实空间并置的城市影像空间。同样,《我和我的祖国》之《夺冠》(2019)巧妙地将镜头聚焦于20世纪的上海弄堂,通过多角度的特写镜头与略带暖调、梦境般朦胧的画面色彩,缓缓铺陈开一幅鲜活活动的20世纪80年代市民生活画卷。鳞次栉比的老式石库门建筑,错落有致的瓦片屋顶,藤蔓缠绕的老虎窗,序列式的沿街商铺……这些嵌刻在地方里的地域性印记,兼具诗意江南与市井风情的美学意境,随着镜头、场景的转换逐一呈现,构成受众关于上海城市形象的碎片信息。电影以虚构与想象的方式开展影像叙事,成为当下时代与社会怀旧的重要媒介,其重现的别有时代意蕴的地方能将人们带入旧日氛围,让一代人在时光的长河里细细回味往昔。

## (二) 声外之境: 城市音景的生态构成

声音设计不是视觉效果的附属品,以听觉的经验勾勒城市独特的轮廓,能让人感受、辨别城市声响的变化与流动所构成的声音景观<sup>[3]</sup>。声音景观是想象与建构时代意识的焦点。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电影的语言与声音构成的声景如棱镜般折射出人的听觉喜好、听觉向往与听觉留念<sup>[4]</sup>。故此,不同于战争片、科幻片与动作片等奇观电影,城市电影通常少有听觉震撼与冲击的要求,反而更重视声音的真实性与表现力。《我和我的家乡》之《鸭先知》(2020)传递出的是弄堂里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小贩吆喝声、街坊邻里的家常闲聊……《请你记住我》(2018)让我们听到的是弄堂拆迁的坍塌声与垂暮老人的叹息声。《长恨歌》(2005)中,民国时期弄堂中邻家留声机流淌的老上海歌曲、深夜深巷传来影影绰绰的敲钟声、新中国时期城市广播中的动员口号等彰显时代特征的声标,更是让里弄成为映现时代变迁的重要注脚。

新世纪城市电影从城市空间中的差异化地方

提取声音符号,通过拼接这些包蕴世间万象、可感可知的听觉符码,使声音与地方建立深刻的对话关系。人的大脑在接收声音时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即听觉刺激到人耳后会转化为神经冲动传到大脑,大脑再根据以往的记忆表象对此做出解释后,再产生判断并作出反应<sup>[5]</sup>。城市影像空间某处地方所发生的声音变化,能唤起以往的记忆与历史经验,并作用于人们的生活,进而产生怀旧与不舍的情感。影像空间中声音景观的变化,不仅展现出城市景观更迭的复杂性与社会性,更揭示了影像背后有关城市记忆的流转与传递。

电影中的声音可以与影像互相影响、感染,使二维的影像更立体,并影响观众的情感<sup>[6]</sup>。每座城市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声音,这是其彰显独特性的有效凭证。作为城市的产物与印记,方言不仅能展现城市文化,还能引发观众的情绪共鸣,是建构一座城市声音文化的重要听觉元素。地域性语言是一座城市声音文化的有效标识,城市电影中的听觉景观更是离不开在地化语言的建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之《夺冠》篇就细腻地捕捉到了弄堂内家家户户、街坊邻里间的生活语言,于方寸间凸显画面无法传递的生活质感与地域风情。电影具有的天然优势能让观众以“声”辨城,成为跨越地域及文化障碍的主要渠道。吴侬软语的上海话语境,在听觉景观上不但能唤起地方成员的文化认同,还能增强影片独到的地域特色,渲染浓烈的文化氛围。

新世纪城市电影将上海独有的地域性声音与语言从繁杂的空间中提炼出来,通过声音与画面的并置来构建多元且立体的城市空间,令观众在影像空间内沉浸式体验与想象这一都市地景。

## 二、镜像与映射: 城市电影空间中的里弄意象

城市是电影植根的土壤。在西方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之时,电影应运而生,电影业在城市化进程中也逐渐形成、发展起来<sup>[7]</sup>。电影与城市二者互为镜像,彼此依靠。社会恒进,地方常变,因而,地方概念里还存在时间的维度。当我们在分析一个地方的特征及其含义时,需将其放在特定的时间维度里才具有意义<sup>[8]</sup>。城市电影将城市空间作为叙事场景,关注城市空间中某处地方的变化,

以此作为城市的符码表征来透视与映射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生存空间。弄堂陋室,街巷阡陌,一处地方,几经沉浮。当今,城市现代化转型的浪潮汹涌澎湃,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将里弄卷入其中,其在城市影像空间中的变化,能映现人们真实的社会空间与生存状态,成为市民生活的重要能指。从“地方”这一观察视点出发,在当代城市影像空间中挖掘上海里弄背后的隐喻与意义,探讨人与地方的情感依附与关联,能够延展我们对城市的思考、对社会空间的反思,完成地方影像同精神与思维的联姻。

### (一) 出租屋: 离乡者的生存与归属之惑

作为独特的城市观察媒介,电影影像细致地捕捉并客观记录城市中的多元景观及其相对的空间布局。这些城市表象不仅是背景,更深入地映现出复杂的人物关系与社会的现实状况。亚里士多德认为,城市由各种不同的人构成,相似的人无法让城市存在。自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腾飞最为世人所瞩目,其被人们想象成一块蕴含无限机遇与可能的“黄金宝地”,吸引了众多外来人员入沪务工。这一群体自然也成了备受关注的焦点人群之一。由真实新闻事件改编的电影《到阜阳六百里》(2001),聚焦经济发展浪潮下来沪务工者的生存状态与心理境况,以现实主义风格叩问、探究这一边缘群体所面临的身份认同与归属难题。电影主创团队采用真实的创作笔法。影片故事虽发生在上海,却并未刻意展现太多上海大城市的现代气象,剧情基本上限制在破旧的老式里弄内部,昏暗的灯光、狭小的空间,代表着一种下层社会窘迫的生存环境<sup>[9]</sup>。《到阜阳六百里》通过底层视角书写现实生活,令观者在影像空间内了解与关注底层民众的现实境遇。

在文化地理学中,家被认作“地方”的典范。“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把家作为地方的意识”<sup>[10][11]</sup>,人们的基本需求可以在这里得到关注与满足。作为典型的城市空间形态,里弄常呈现为家的意象,并提供居住的功能。从该层面分析,我们能深入探讨人与里弄之间的关联。在《到阜阳六百里》中,里弄以出租屋的意象呈现于银幕,成为曹俐和谢琴等外来同乡人临时的藏身所与庇护所。就其他地方而言,家更被视为意义中心及观照场域,是充当地方的一种隐喻<sup>[11]</sup>。如是,对于曹俐、谢琴

等其他外乡人而言,里弄就是他们同乡人惺惺相惜、能够相互依偎的“地方”。无论是现实空间还是精神空间,皆如此。在经过殚精竭虑的一天后,他们能在此地短暂地安放自己的情感依托与生命意义。

空间被人类赋予价值与意义成为一处地方,这是一个“人化”的过程,人归属于某个地方后,就会产生一种归属感<sup>[12]</sup>。城市在给人们提供机会的同时,也制造了许多问题。人口向城市迁徙是我国城市化的主要驱动力。在该进程中,外来流动人口仅在经济体系上被城市接受,而其他体系,如社会体系、制度体系、文化体系等,并未接受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心理认同层面缺乏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sup>[13]</sup>。没有归属,何谈归属感?对于这一特殊群体来说,“主人翁”意识的缺失与身处的边缘性地位让他们难以在城市中获得认同感,缠绕他们的更多是疏离感与边界感。虽身处城市之中却又被城市排除在外的底层民众一直都在苦苦寻求能让他们心安的归属感。《到阜阳六百里》映现出曹俐、谢琴等人对大都市上海的无限向往及身份认同的迷茫。谢琴为获得上海户口,让母女俩能够扎根于此,甘受质疑与歧视,争抢破旧里弄,企图与土著联姻,但终究梦碎,黯然返乡。影片中低矮狭窄的古老弄堂与高耸林立的现代大厦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出城市快速发展中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并置和对立。里弄异化为出租屋的意象,映射出来沪务工人员都市底层空间杂乱无章的生存实录与疑惑迷惘的生活状态,令观众进一步关注与省思城市化浪潮下草根人群的生存空间。

### (二) 废墟: 城市与家园破裂的精神之殇

在上海城市化进程大步迈进、城市空间焕然一新的时候,城市也在拒斥一些前现代景观。里弄是凝视城市空间风貌变迁的见证者。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老上海曾经有3840条里弄,占全上海居住房屋面积的52.6%<sup>[14]</sup>,然而到2013年时,里弄的数量已经锐减到1490条。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与住房体制改革的加快,现代性进程吞噬着历史悠久、意蕴深厚的上海建筑与民居文化,许多里弄被拆迁,其折射出在城市转型时期的现实空间生存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底层市民精神空间的动荡与迷失。

地方是人性化的空间,是人类感知自我生命价值的中心点与场域。其间,房屋是提供栖息与关怀的场所。房子始终触及芸芸众生最为敏感与脆弱的神经,它是社会关系的纽带,也是衡量人类生活质量与生存状态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

电影《阳台上》(2019)将镜头对准面临拆迁的老式弄堂,关注拆迁背后草根边缘人群与底层弱小者生存的刺痛,整体呈现出颓废伤感的影像风格。“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sup>[15]</sup>家是我们获得安全感与归属感的空间来源,具有一定的保护性与稳定性。男主人公张英雄一家生活在弄堂深处,面对突如其来的拆迁规划,其本就不和谐的生活状态被无情撕裂。作为一种“灵魂状态”,即便家宅的外表被改造,但它还是表达着内心空间<sup>[15]90</sup>。影片多次出现弄堂废墟与摩登高楼意象的对比,弄堂空间的稳定性发生崩塌,隐喻人物在家宅遭遇分崩离析后强烈的彷徨感与失措感。经受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挤压等多重打击后,张英雄的身体无所依傍,宛如一位都市精神流浪汉徘徊于街头,四顾茫然,努力找寻自己的存在意义与未来方向。城市与家园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被拆迁破坏,被摧毁的空间背后,暗喻着城市居民精神世界的崩塌与重建<sup>[16]</sup>。废墟的意象与硕大的“拆”字,高频呈现于当下社会的现实空间与影像空间。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发生的变化,既是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微观写照,亦从侧面反映了部分底层老上海人的心理面貌。

### (三) 故土: 城市化浪潮下的怀旧乌托邦

当下,新的城市空间的策划与开发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旧的城市空间逐渐倾圮与崩塌。“当一个民族察觉到变化发生得太快,以至于超出其控制能力时,对田园牧歌般的过去的怀念就会增强。”<sup>[10]161</sup>在城市搬迁、拆迁与变迁的过程中,市民长期居所形成的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与邻里关系因此断裂,怀旧情愫成为极其典型的社会文化景观之一。不论接受与否,现代人都在经历身体与心灵的加速变迁,流动性成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当人们感知到自己赖以生存的世界变化太快时,他们的特定反应就是回想起理想化且稳定踏实的过往。“在一个生活节奏和历

史节奏变迁加速的时代里,怀旧不可避免地就会以某种防卫机制的面目再现。”<sup>[17]</sup>若将城市化归为现代化的特征之一,那怀旧则是我们面对现代文明的防御机制与抵抗姿态。

詹明信曾提出“对现在的怀旧”的观点,即后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使怀旧感不再仅指过去,亦逐渐指向现在发生的事情。上海的城市面貌自进入现代化以来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景观的原始面貌被迅速改变。狭窄矮小的里弄存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轨迹与人生记忆,巷子里的叫卖声、弄堂中的烟火气,在建筑倒塌之后一并消失殆尽。电影以影像的方式支撑起已破碎的往日风景,治愈现代人因场所变迁而产生的不可调和的怀旧心理顽疾,成为人们思恋与追慕的怀旧“乌托邦”。里弄被定义成怀旧空间,人们在观影过程中获得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

导演彭小莲深刻地表现出她对家乡上海的一往情深,其电影通过时间和空间维度、历史和现代维度的交织,以温暖现实主义的笔法披露了现代化进程中里弄的演变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城市问题。人与地之间存在的“恋地情结”有一项重要的元素就是恋旧<sup>[18]</sup>。人对地方的熟悉程度与恋旧程度越高,恋地情结就越发强烈。作为多数老上海市民的祖宅,里弄空间是最为重要的记忆载体,大家熟悉并依恋这里的环境,早已将里弄视为心中的故乡。《我坚强的小船》(2008)借里弄老人之口,娓娓追忆60年前石库门的往昔岁月,通过孩童率性纯真的记录视角再现弄堂遭挖掘机摧毁后的凄凉景象,经由摇晃、稚嫩的镜头语言,隐喻老一辈市民对弄堂旧有生活方式、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及逝去光阴的依恋与感慨。在《海上浮城》(2018)中,钉子户王女士精心装饰的居所与悉心珍藏的物件,共同映射出她对故土消逝的抗拒与难以割舍的情感。于她而言,里弄如同家谱,既是安身立命的栖息之地,更是应誓死守护的精神家园。当她迫于现实因素而不得不离开时,贯穿全片的《我只在乎你》的旋律在片尾再度响起,伴随着鸽子展翅飞向天际的画面,兀自矗立在汪洋废墟中的里弄,与前者共同构成极具悲凉意味的隐喻。

扎根是人类的本性,人们对地方的紧密依附以及随之产生的熟悉感构成了人的根性。只有当我们真正扎根在一个地方且这个地方成为我们的

家园时,该地方才会与我们的生存变得密不可分,并与属地产生心理情感上的深度联结。当下,液态社会的流动性与大众文化的流行性正日渐摧毁现代人的根性,地方情感的缺失已成为现代人的实然状态。如何唤起人地互动,深化人与地方的情感连接,避免人地生疏,是我们不容回避、亟需思考的问题之一。作为最为直观的故事场域,电影尽可能地集聚地方意义的生产及地方形象的建构。新世纪城市电影对上海里弄的影像建构,不仅向我们展示城市空间中地方的不同切片及其能指,启发我们思考人地关系,同时更凸显极其深刻的地方影像价值。

### 三、文化与认同:城市电影中里弄影像的价值旨归

“以空间的概念来定义城市,就是将其视为社会关系和社会流动汇集的场所,它们会聚在一起凝成了城市的气质与精神特质。”<sup>[17]</sup>电影需要捕捉城市的内在气质,以完成观众对一个时代的想象与认知。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电影塑造的都市地景、地方意象对塑造城市认同感、建构向心力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作为老上海的主体建筑群落与地缘文化载体,里弄如桥梁般连接起上海的过去与当下,其深厚的文化印记与浓郁的人文精神,成为彰显上海城市文化特征的物质语言之一。

#### (一)城市记忆的形塑与传递

作为庞大且复杂的影像系统,电影是书写城市生活记忆的重要媒介。它构建的各具特色的城市空间风貌、话语言说方式及各类人物群像,均能够唤起人们的城市记忆,并将其内嵌于中国故事与中国精神之中。“城市记忆”应从“文化记忆”这一概念来进行解析,其存在于城市空间环境,包含模仿性记忆、对物的记忆与交往记忆,并且在形成过程中,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共同发挥着作用<sup>[19]</sup>。记忆看似个体私事,但其显然具有社会性,我们总是借助地方的生产,如博物馆、匾额、碑铭与特殊建筑物等媒介来建构记忆。当下,大众生活在一个影像弥漫的时代,其鲜活记忆借由视觉影像来叙述传承。作为一座城市的故事叙述者,城市电影将人类对地方的往昔经验及历史记忆纳入叙事,令不同代际的观众在影像叙述中延续自

己的城市记忆。

中国电影史上曾有太多关于上海的故事,特定社会语境使然。彼时的上海被塑造成繁华、堕落或腐朽的地域形象,这些想象集聚在一起,形塑了人们关于上海的文化记忆。当下,书写上海的城市电影根植于社会现实土壤,借助历史记忆与现实语境建构起弄堂街巷的“想象空间”,重绘上海传统文化的地图,形塑与传递城市记忆。作为旧上海帮派权力博弈的场所,里弄不仅是市井生活的日常空间,更是各帮派势力角逐的隐秘舞台。《罗曼蒂克消亡史》(2016)通过极具张力的视觉呈现,揭示了里弄所承载的暴力与阴谋,其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与暗流涌动的权力关系构成一种独特的空间政治,隐喻着动乱时期暗藏在弄堂下的波诡云谲。

地方建筑属于地方艺术,携带着人们对地方的原生情感,唤醒人与地方相关联的情感记忆及人们对地方往昔的历史回忆<sup>[20]</sup>。作为地方建筑,上海里弄曾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与活动的重要场所,拥有内蕴深厚的红色文化印记与红色历史记忆。地方又具有物质性,这意味着记忆并非反复无常,而是铭刻于地方之中的。在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与100周年之际,《建党伟业》(2011)与《1921》(2021)通过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赋予里弄空间以革命性,用人民性的书写方式将重大历史事件以非官方叙述的姿态存留于个体记忆中。西美尔曾提出眼睛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学成就”,强调只有视觉才能拥有和占据并提供我们可拥有的财产,而这种占有力量的最佳见证,就是摄影技术的发展<sup>[21]</sup>。电影通过镜头潜入城市深处,使观众能沉浸式体验影像世界。在《建党伟业》中,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地,望志路106号弄堂成为被观看的客体,其内部亦成为受众可接近的历史空间。影片通过人物在弄堂空间的行动轨迹及电影镜头展示的人际互动,让受众感知到上海的意蕴与氛围。这不仅打破了现实与历史的壁垒,亦勾连起人们的情感记忆与历史回忆。

“城市中的历史街区与文化景观象征城市记忆的本质,凸显城市特征与属性。”<sup>[22]</sup>曾发生于上海里弄的市井世情、个体经验等故事夹杂着历史的萧瑟感与时代的沧桑感,影像生产打破时空

拘囿, 沉淀了深厚的历史文脉与文化记忆, 消弭了现代都市人的时空疏离感。

## (二) 城市地方感的生产与再造

当下诸多城市规划与景观再造均忽略了地方影像的重要性。地方影像并非只是对城中一隅的记录, 而是“某一区域内, 具有本土性、民族性文化特征的影音综合体”<sup>[23]</sup>, 承载着人们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城市空间的地方独特性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被急剧吞没、夷平与风化。如此, 地方感被肢解破碎, 甚至存在被消除的风险; 当下, 全世界呈现“迪士尼化”的奇观现象, 原本特色鲜明的城市正在被单调浅薄且无地方感的平面风景所取代, 其无地方性特征日益凸显。地方感一是指“地方自身固有的特征”, 其是独特的、有纪念性意义的; 二是指“人们对一个地方的依附感”——人们通过依恋、体验对地方产生深刻的依附感<sup>[24]</sup>。二者相互区分, 又相互关联。短时期内大规模的城市改造, 使汇聚记忆的地方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灰飞烟灭, 由钢筋混凝土垒积而成的一块块“方盒子”以极其相似的外貌被不断迅速复制, 里弄地标被千篇一律的塔楼所取代, 一个又一个街区失去了地域特色与尺度标识, 其导致地方物质性空间与文化性空间均质化、同质化。无地方性愈加明显、地方感愈加淡薄的社会文化现象, 愈发昭示地方感生产的重要性。

物理建筑、发生的行为与地方意义是构成地方感的三个要素。“地方感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媒介, 可以说当下的建筑意象及地方文化意象乃至地方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影像来表达与建构的。”<sup>[25]</sup> 城市影像空间中的上海里弄作为地方影像, 是一处由人、事、物交织的密切关系网, 其将孤立与零散的视听符号统一为经验记忆与现实感官, 是联结个体生命情感与日常生活经验、生产地方感的必要媒介。“为了充分体验并准确认知某一地域, 需要人们调动全部的感官来获取相关的社会文化地理信息, 其中通过听觉器官获取声景信息是重要一环。”<sup>[26]</sup> 地方性语言与其依存的地方环境相联结, 构筑独特的声音景观, 成为塑造城市地方感、传播城市文化与建构城市形象的特殊景观符码。作为近年来鲜有的纯沪语电影, 《爱情神话》生动再现弄堂门户间浓郁的烟火气息, 构筑鲜活生动的民族性与地域文化语

境。在语言传播层面, 影片中弄堂里弥漫着的极具地域特色的上海话天然设置了一定的接受门槛, 表面上看似隔绝了外地观众, 实则展现并建构了独特的上海文化特质。“个体认知往往是开启人地互动的钥匙, 人与地方在互动中展开的文化实践及其共享的意义也是从认知中开始的。”<sup>[27]</sup> 本地观众或曾有过上海生活体验的观众对环境均有一定的熟悉度, 具有“局内人”的视角, 他们在观影时便会不自觉地将自身身份角色与影片中的场景并置, 并在现实空间与影像空间穿行, 继而实现人地互动。这种互动不仅唤起观众对地方的经验记忆与情感依恋, 还能让观众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温度与质感, 进而与属地产生强烈的地缘连接与情感共鸣。

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 行色匆匆的城市人群越发需要依靠地方文化与地域特色来获得归属感与身份认同。地方特有的声音景观与影像相结合所带来的视听符码的双重体验, 能充分营造上海的地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 电影作为媒介, 构筑独一无二的城市地方感, 成为连接人与地方的支架, 唤起观众对特定地理场域的信仰与共情, 激活他们的往昔历史记忆与个体生命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液态的流动社会中现代人因脱域而产生的精神漂浮感与历史割裂感, 使其在赋予人精神皈依的同时, 强化了人们对城市的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

作为人类创造与活动的空间, 地方是凝聚人们生命意义的支点与场域。毋庸置疑, 作为城市空间中差异化的地方, 上海里弄是一处不容忽视的有关人与地方关系的绝佳考察切口。基于此, 人对地方的地缘根植与情感依附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 人的生存空间与精神空间一旦遭受挤压, 怀旧情绪的漫溢、恋地情结的浓烈等议题该如何书写。笔者尝试从地方视角来解读电影。这一视角使得那些于时代褶皱下, 在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中被遮蔽的群体、被掩盖的角落, 逐一浮出历史地表。概言之, 借由地方视角所挖掘出的影像价值, 能让地方影像更具人文关怀与现实内涵, 有助于开启城市影像空间思考的新视界与新阶段。

## 参考文献:

- [1] 方玲玲. 媒介空间论: 媒介的空间想象力与城市景观

- [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 86-87.
- [2] 杨秉德. 多元渗透同步进展: 论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多元化影响的渠道[J]. 建筑学报, 2004(2): 70-73.
- [3] 芦影. 城市音景, 以听感心: 作为声音研究分支的城市声态考察[J]. 艺术设计研究, 2012(2): 82-86.
- [4] 朱熠. 当代城市电影声音景观的书写探讨[J]. 未来传播, 2019, 26(4): 103.
- [5] 林玉莲, 胡正凡. 环境心理学[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0: 4-5.
- [6] 汪月波. 米歇尔·希翁的电影声音理论研究[J]. 当代电影, 2018(5): 127.
- [7] 路春艳. 中国电影中的城市想象与文化表达[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8] 邵培仁. 地方的体温: 媒介地理要素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记忆[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6(5): 147.
- [9] 邓勇星, 倪震, 石川, 等. 到阜阳六百里[J]. 当代电影, 2011(5): 41.
- [10] 段义孚. 空间与地方: 经验的视角[M]. 王志标,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 [11] 蒂姆·克雷斯韦尔. 地方: 记忆、想象与认同[M]. 徐苔玲, 王志弘, 译. 台北: 台湾群学出版公司, 2006: 42.
- [12] 周尚意, 唐顺英, 戴俊骋. “地方”概念对人文地理学各分支意义的辨识[J]. 人文地理, 2011, 26(6): 11.
- [13] 崔岩. 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2, 27(5): 143.
- [14] 张鹰, 王沫. 浅析上海石库门里弄建筑的演变及装饰特点[J]. 美与时代(上半月), 2009(12): 75.
- [15] 加斯东·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M]. 张逸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 [16] 林筠. 城市为乡 何以为家: 迁电影中的城市构建与故乡表征(2000—2020)[J]. 当代电影 2021(4): 126.
- [17]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 怀旧的未来[M]. 杨德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xiv.
- [18] 段义孚. 恋地情结: 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观研究[M]. 志成, 刘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151.
- [19] 汪芳, 吕舟, 张兵, 等. 迁移中的记忆与乡愁: 城乡记忆的演变机制和空间逻辑[J]. 地理研究, 2017, 36(1): 7.
- [20] 罗易靡. 地方、记忆与艺术: 回到地方场所与往昔的历史经验[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38(2): 153.
- [21] 加里·布里奇, 索菲·沃森. 城市概论[M]. 陈剑峰, 袁胜育,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5: 411-412.
- [22] 刘阳, 王绍森, 杨华刚, 等. 城市记忆空间的重构研究: 以厦门市第八市场为例[J]. 当代建筑, 2023(9): 51.
- [23] 李欣. 从媒介地理学的角度看北京地方影像的生态[J]. 当代电视, 2014(5): 94.
- [24] R J 约翰斯顿. 人文地理学词典[M]. 柴彦威, 蔡运龙, 顾朝林,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637.
- [25] 邵培仁, 周颖. 华夏营造: 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华古建筑[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6, 37(9): 167.
- [26] 刘爱利, 刘福承, 邓志勇, 等. 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声景研究及相关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11): 1454.
- [27] 李苏, 张淑玉. 认知、情感与意向: 地方文化认同及其建构维度研究[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9, 28(7): 110.

责任编辑: 黄声波